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印章）

合订本 第五十一卷

希望过了3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
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30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周恩来

中国文史出版社

总第
149 | 151
辑

总第
149—
151
辑

文史资料选辑

（集）

合订本 第五十一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耆年忆旧

我的求学和外交生涯/003

◎ 王家楨

我在北京总统府12年的见闻/018

◎ 陶树德

南洋流亡记/033

◎ 徐安如

证券保险

上海证券业的初期情况/054

◎ 俞莱山

重庆证券交易所的兴亡/058

◎ 卢澜康

从事保险业30年经历记/066

◎ 许良灏

交通邮政

外资在甘肃开办的邮政局/79

◎ 毓 运

1926年传真电报在京津开业记/83

◎ 夏沧一

人物述林

孙中山先生北上与叶恭绰的财政任务/85

◎ 叶子刚

爱国老人刘国钧/88

◎ 施宪章

忆父亲王柏龄/105

◎ 王德模

夏之时策动龙泉驿起义前后/111

◎ 廖士元

熊克武被关押在虎门前后/118

◎ 钟子勋

艺海生涯

我与父亲的昆曲生涯/127

◎ 张小楼

民主斗争

民盟在民主革命中的艰苦斗争/155

◎ 周新民

从民建发起到“较场口事件”/160

◎ 林涤非

回忆旧政协会议期间的民建会/170

◎ 范尧峰

“较场口血案”中的劳协/176

◎ 叶维民 范振声

重庆“较场口事件”见闻及其前后/190

◎ 钟复光

我参与审理“较场口血案”/197

◎ 汪 廉

张澜先生在重庆/208

◎ 沈自强

鲜特生的“民主之家”/212

◎ 吕光光

民国政事

重庆“二二八”事件纪实/225

◎ 陈文荣

参加国联讨论日本侵华的几次会议的回忆/240

◎ 王家桢

抗战纪实

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与山东抗战/256

◎ 张友渔

回忆抗日战争二三事/260

◎ 张素我

七七事变回忆/264

◎ 徐逸樵

流亡万里到渝州/267

◎ 伏笑雨

记举世闻名的一条空中运输线/280

◎ 赵 新

中国远征军缅甸战役纪实/286

◎ 周郁谋

军事史苑

国民党军窜犯东山岛遭到惨败的经过/317

◎ 陈士彦

中央军事慰劳团简介/323

◎ 刘子英

人物述林

纪念二伯父孔祥柯/332

◎ 孔令仁

记珠海唐家为清华服务/335

◎ 唐绍明

男女平等的先驱——黄炎培/342

◎ 曹淑瑞

杜聿明与东北中正大学/345

◎ 焦实斋

于右任为什么从重庆出走成都/348

◎ 高一涵

民主斗争

我参加民主建国会活动的一些情况/353

◎ 徐崇林

我参加“民联”组织的回忆/369

◎ 苏从周

上海“大通别墅”聚餐会点滴/373

◎ 范尧峰

人物述林

两度相随蒋经国的经过/376

◎ 李以勳

军事史苑

第一五〇师的组建和起义始末/400

◎ 方人熙

刘湘死后潘文华在四川的活动/412

◎ 郭造勋

我在战地服务团和励志社的经历/425

◎ 黄富强

参加军事督导组的活动见闻/432

◎ 邹继衍

抗战纪实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慰劳总会”工作片断/440

◎ 张肩重

为支援救亡工作发售爱国奖券的始末/444

◎ 韦锡九

抗战中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448

◎ 刘良模

工商史苑

上海大中华橡胶厂的坎坷道路/451

◎ 沈 堃 余性本 薛仰清 白 江

五代经营的云南永茂和商号/461

◎ 李镜天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概况/476

◎ 张自立

我国铅笔工业的崛起/480

◎ 邹修庵

史海钩沉

伪天津市长温世珍时期群奸罪恶活动纪略/489

◎ 天津市政协“日伪时期史料”专题小组

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502

◎ 周作人

体坛精英

盖斯特杯，你到底有多重！/510

◎ 邱钟惠

跳远项目的第一块金牌/516

◎ 邹振先

第一次夺得世界速滑冠军/520

◎ 王金玉

射击场上显神威/526

◎ 李亚敏

难以忘怀的冠军之路/530

◎ 吕 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四九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耆年忆旧

我的求学和外交生涯

◎ 王家桢*

1912年春，我已念了五年私塾，从《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到《书经》、《诗经》都念完了，可惜的是没有一个先生给讲过书中的意义。此时我已经15岁了，不知将来干什么，心里很苦闷。正在此时，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劝我到吉林去报考中学。我说服了父母，便到吉林去报考。到了吉林省城，我才体会到，一个乡下孩子既未上过小学，也未见过学堂是什么样子，就来上中学，谈何容易！当时中学是四年制，只有一个省立第一中学，还有一个师范学校。这两个学校我都没能考上，只有插班入箐华中学。这个学校原是八旗学堂，民国元年才改为中学，专收八旗子弟，全部是公费。我托在箐华中学教书的远房亲戚帮忙，求他让我进中学学习。等了两个多月，到了4月中旬，箐华中学才批准我入学插班上课。一进学校，我就惊喜万分，因学校不仅发制服，还发纸张笔墨，上下课、起床、就寝都有定时，不同于私塾。可是到了真正上课时，我就茫然若失了。因为学校开有我从没有学过的课程，如数学，并已经学到代数了，而我连阿拉伯数字还没见过；英文文法也学到了第二册，而我是第一次知道英语这种语言；至于物理、化学就更不用说了。当时的学校还是比较重视国文、历史、地理一类的东西。自我入校以来就勤勉地学习，上课不漏一句话，不懂就请教同学。两个多月后，期末考试时，我名列全班58人中的倒数第二。自第二学年起，我的学习成绩就名列全班第二三名了。第三学年，箐华中学并入吉林省立第二中学，原箐华中学两班120来个学生只剩下80来人。第四学年又被并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第八班，教员全是北京高师毕业的。所以，我这三年半的中学是比较好的。到1916年6月，我从吉

* 作者曾任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等职。



林省第一中学毕业。

1917年春节过后，我又到吉林省城找原管华中学校长，告诉他我想上大学，但家里穷供不起。他告诉我，只要你能去北京考大学，每年可领240元公费（还是那笔旗款）。于是，我于1917年3月到了北京，先报名交费上了中国大学，准备暑假时再报考北京大学。入夏后的一天，街上忽然人群慌乱，号外满天飞。我从人群中抢到一张号外，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张勋把溥仪扶上台搞复辟了。一天凌晨，忽然炮声大作，日出后炮声更烈，炮弹的爆炸声离我们的公寓越来越近，我和同屋的两个同学都坐在土炕底下不敢乱跑动，直到午后三四点钟炮声才停息。我们三个便到街上想看个究竟。街上已经没有戒严的气氛了，我们就到天安门前去看热闹。在中华门两侧红墙底下全是段祺瑞的兵马，足有万把人。那些兵一副人困马乏、疲惫不堪的样子。大约到了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响了一枪，段祺瑞的队伍一哄而起，马蹄声、子弹上膛声震耳欲聋，一个骑马的大兵用枪托指着我们说：还不快跑！于是，我们沿着中华门前的石板路拚命向南奔跑，出中华门西便门一直跑到绒线胡同一家卖酸梅汤的小铺子，我们三人一气喝下了一桶酸梅汤。第二天，我们三人全病了，但没想到一个同学经中西医医治无效竟然去世了。我们给他父亲打去电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位同学的老父亲，千里迢迢从东北赶来后的悲伤情景。

这年暑假，我已考中北京大学法科，但要等9月中旬才开学，我觉得有点不满意。正在此时，传来消息说我可以去日本留学，在未正式考入规定的日本大学前还可以拿原八旗学堂公费，等考上所规定的日本大学就可以领省公费。于是，我于1917年11月初东渡日本留学。

在日本留学时期

我是1917年冬天到日本东京的，1919年春考入日本庆应大学。当我到日本东京后不久，因为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缔结了军事合作协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亚，镇压俄国革命，中国留学生总会组织了大规模游行，到中国驻日使馆请愿。我们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直抵大使馆正厅。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正厅前接见了我们，并回答领队提出的各种问题，在一个多小时的问答后，他就悄悄溜回房内，把房门紧紧关上了。一些学生高声叫他出来，一些人干脆就用阳伞砸使馆的门窗，顿时，使馆的正门被砸得稀烂。据说，这是留日学生第一次游行示威活动，日本警察也没有干涉。

1920年4月底，留日学生总会开会讨论举办“五七”国耻纪念日活动时，有人针对二十一条中第五条关于旅大租借25年期满延期问题提出应该组织留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坚决反对延期。此建议获得大家一致通过。和

我同住一公寓的同学胡俊爱国热情很高，要杀死驻日使馆代办庄某。我反对这种做法，劝他：你杀死一个与卖国协定无多大关系的小小代办，于我们的爱国游行有何补益？他当时接受了我的劝告。但到游行那天早晨，我发现他新买了一把二尺多长的庖刀。我问他：“你拿这个干什么？”他愤然地说：“别管我！我决心杀死他！”

这次游行人数最多，队伍约有一二里长。我们从神田区出发，直奔赤坂区的中国大使馆。刚到使馆前，我们的游行队伍就被日本马警拦阻住。于是在使馆门前，日警的马蹄声、学生的喊叫声混成一片，后边的游行队伍没有后退，一起向前拥挤，日本警察也越来越多，后来就发生了一场大混战，一直打到下午4时才逐渐平静下来。我回到公寓，到晚饭时也没见胡俊回来，打开晚报一看才知道，新闻记者们一直在现场采访混战情况，对被捕人数、双方受伤人数报道得很详细，比我们亲身参加者知道得还全面。有一条报道说：有一顽猛的留学生在与警察搏斗时，手持一把庖刀将警察的手指砍掉一个云云。我一看就知道是胡俊干的，他肯定在被捕者行列了。第二天，我们一面营救被捕者，一面慰问受伤者。经日本对华友好人士的帮忙，被捕者除胡俊被判刑外，其他人都被释放了。胡俊在狱中被打伤且伤势很重，留学生又进行了抗议示威，同时争取舆论界的支持。约一个月后，胡俊也以缓刑而被释放了。留日学生总会还给胡俊颁发了一枚金牌，以表扬他的爱国精神。这次留日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在留日学生爱国运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以后也没有过这样的规模和这样的激烈程度，更不用说一些赤手空拳的青年学生不畏强暴、有进无退地与警察搏斗了六七个钟头，战斗时团结一心，事后也互相慰问，齐心协力地营救被捕者，当时那种纯洁无私、团结对敌的气氛，至今思之，犹觉神往！

1922年春，我被留日学生总会推选为执行委员的头头。按留学生的惯例，每年5月7日都要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在执委会开会商量这年的国耻纪念大会如何搞时，大家一致决定不举行游行活动，只开纪念大会。5月初，日本便衣警察来访问我，问我今年纪念会游不游行。我说不一定，如无特别干扰，我们执委的意见是不举行游行。这个便衣警察一听连连说：好，好，咱们来个君子协定，我们不派一个警察去会场就是了。5月7日，我们在中国青年会开大会时，到会人数很多，会议进行得也很顺利。就在会议就要结束时，忽然从人群中跳出一个广东籍学生，他跳上讲台，慷慨陈辞，没讲几句（因能听懂广东话的人不多）就把自己的手指咬破，写了一份血书。他手提血书号召大家游行示威，顿时，会场沸腾起来了，一致要求举行示威游行。于是，我们准备了大小旗帜，排好游行队伍就浩浩荡荡出发了。队伍出发不久，数百名日本骑警就拦住我们的去路。那个曾经访问过我的警察对我大声吼道：你们在我们国家反对我们，我们已容忍你



们在屋子里搞，而你也答应我不游行，现在你又失信，岂有此理！我怕出事，一边同他争辩，一边想解决办法，最后达成妥协，即我们派出二三十个代表去使馆，两边的队伍在原地等候，待代表回来后再各自回原单位。这次国耻纪念大会就这样结束了。

自从1922年我担任留日学生总会头头以来，我的社会活动就多起来了。另外，我还担任吉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东三省商报（在哈尔滨）委我为驻日特派通讯员（月薪30日元），中国驻日使馆与横滨总领事馆派我为在日华工利益保护共济会交际员（月给车马费30日元）。同时我的功课也很紧，因为学校规定，年考不及格者留级，连续两年留级即开除学籍。为了能按时完成学业，我在1923年5月7日国耻纪念大会前提出辞职，在此次大会上致词后就离开会场，从此再也没有参加学生的爱国活动。

在日华工

1921年，日本经济在一战后得到很快恢复，各业出现了兴旺景象，所需劳力也在增多，所以从中国浙江等地招募了大批华工到日本，主要做土木粗工。他们都是由日本把头包给中国的工头成批来日本的。到1922年，粗略统计约有两三万人之多。这些乡下农民来到日本后，人生地不熟，被日本把头和中国的工头层层剥削，不但工资拿不到，有时连饭都没得吃，甚至常常受朝鲜工人的欺负，被打伤、打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些华工及其工头都不会讲日语，也不懂普通话，所以使馆招募留日学生总会和东京中国青年会（教会组织）共同组织“日本华工共济会”，由青年会干事王希天主持共济会内部事务，我负责对外交涉事宜。在共济会，我共待了一年多的时间。其间，为了工作，我几乎跑遍了全日本。记得有一次，在一个离东京很远的地方，几十个华工因日本把头不发工资，中国工头来找我交涉。我到那找到日本把头，问他为何不按期发工资？这个家伙即刻拔出匕首威吓我。我怒斥他持刀威吓人是犯罪行为，他才软了下来，并将积欠的工资如数当面付给中国工头。原来，他用这种野蛮行动吓过其他人，所以才敢在偏僻的地方欺负无知的中国人。还有一次，几个中国工头来找我，他们的工地有好几百名华工，同时也有比他们更多的朝鲜工人，不知因为什么事两国工人打了群架，中国工人多人都被打成重伤，朝鲜工人没有重伤者。但日本警察偏袒朝鲜人，反令中国工人赔偿损失。听后我立即跟他们来到工地，先看了看受伤的工人，有几个确实伤势很重，已被送进医院：我找到该地警察局长，要求他拘捕打人凶手并赔偿损失（包括医疗费），我还很愤慨地警告他：倘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就以外交关系上控。该局长诚惶诚恐地答应一两天内调查清楚，一定照办。我在小旅馆住